

论战时藏传佛教界僧人的抗日活动

喜饶尼玛

内容提要 藏传佛教僧人在严酷的战争面前,清醒地认识到唇亡齿寒,只有与各民族人民紧紧地维系在一起,才能拯救祖国,最终拯救自己。于是,他们积极投身抗日活动,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同仇敌忾,捐款捐物。同时,藏传佛教高僧也通过抗战活动消除前嫌,增强了内部的团结。本文以充分的史料说明日寇企图利用这场战争挑拨中国各民族的关系,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但是,日本侵华战争反而促成了中华民族的精诚团结——汉满蒙回藏的联合。本文指出,这些藏传佛教僧人的行为,对于鼓舞人民抗日斗志,推动抗战高潮进一步发展,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并进一步促进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与协作,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关键词 藏传佛教界僧人 抗日活动

日寇侵华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场空前的浩劫,它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忘记这一段血泪史。同时,我们也应永远铭记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出的自强不息精神。需要指出的是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时,中国佛教界没有沉默,藏传佛教界没有沉默,一批爱国爱教的僧人基于爱国热情,也投入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战争。他们以“大雄大悲大力”之佛教精神,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同仇敌忾,团结合作,超荐死难的军民,祈求将临的胜利,禱慰伤乱的安定,捐款捐物,坚持抗战,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主张大慈大悲的中国佛教界人士面对血与火的反侵略战争，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他们认为抗日救国与降魔救世的宗旨，“不但相违，而且极相顺的。抗战并非以战争为本质，而为抵抗外来恶势力的侵略战争。非自己发动战争，故中国抗战，乃是为除掉战争，止息战争，而起来抵抗于战争。故抗战的本质，是自卫的，和平的，为保卫全国人民及世间人类正义和平幸福而动的。中国为保国家民族而自卫，为世界正义和平，为遮止罪恶、抵抗战争而应战，与阿罗汉之求解脱安宁不得不杀贼，佛之建立三宝不得不降魔，其精神正是一贯的”。^①他们认为：

“和平是人类幸福所寄托的，推而至一切生物本身，也无不靠了和合平衡才能够存在，失掉了和合平衡，就要破裂溃败甚至消灭。但是人类中常有强凌弱众暴寡的现象，以致和平被破坏，人类幸福被剥夺。在这个时候，要靠爱好和平的人士集中力量，反对侵略的行为，使侵略者知难而退，然后世界和平才能够维持，人类的幸福才能够增进。这与‘和平为体，反侵略为用’，和‘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是完全相符的，也是与我们目前为抵抗暴寇的侵略而抗战的精神完全相符。这种‘和平为体，反侵略为用’，或是‘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换句话说，就是‘武力防御与文化进攻’。举个简单的例来说，战国时代的墨子，主张‘非攻’，就是反对侵略维持和平。可是他并不是口头上说说的，他有力量去阻止人家的进攻，他能够‘守’，使人家的‘攻’不生效力。公输子攻宋国，就是他设法打破了

^① 《海潮音》1938年，第19卷第7期。

公输子的种种计策,使公输子放弃了攻宋国的念头。再就佛教方面来说,最显而易见的是寺里面的佛像,寺门外两旁列着武装的金刚,前殿两旁有武装的四大天王,更后又有朝向正殿的武装的韦陀,这都是表示一种武力的防御,就是表示了能守的佛力。同时,前殿有向外坐的欢喜相的弥勒佛,后殿有向外坐的慈悲相的释迦佛,表出佛教设化救世的精神,更以佛法感化人类,攻去他的暴恶心,唤起他的同情心,也就是一种文化的进攻。反侵略运动就是要集合全世界的和平力量,制止一切侵略的暴行,使侵略者不能不在伟大无比的和平力量之前气馁、反省、安静下来。”^①

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国佛教界包括藏传佛教界僧人身体力行,积极投入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当时日本并无专门的对藏机构,但实际上满铁及蒙疆的特务机关承担了对藏秘密渗透及收集情报的任务。日方甚至提出希望西藏能够支持日本的战争事业,“在亚洲‘共荣圈’内要求西藏的合作”。^②抗战期间还有数名日本间谍潜入拉萨,有的还以僧人名义混迹于三大寺,收集情报,蛊惑人心。但大多数藏族僧人不为所动,爱国热情不减。^③

(一) 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的成立

1931年,蓄谋已久的日本侵略者挑起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由此揭开了侵华战争的序幕。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藏族爱国人士,尤其是藏传佛教界的僧人们,以他们在藏族人心中特殊的地位和影响,立即行动起来,强烈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

① 《海潮音》1940年,第21卷第1期。

② 房建昌:《日本侵藏秘史》,载《西藏研究》1998年第1期。

③ 房建昌:《日本侵藏秘史》,载《西藏研究》1998年第1期。

侵略暴行,坚决要求国民政府出兵抗日。

同年10月7日,十三世达赖喇嘛驻京总代表、雍和宫堪布贡觉仲尼(原为西藏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僧人)及九世班禅额尔德尼驻京办事处处长罗桑坚赞,与西康诺那活佛、松朋活佛等藏传佛教界高僧在南京发起成立了“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大会一致推举罗桑坚赞、诺那活佛等7人为“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的执行委员,成立了文书、宣传、会计、交际4股。诺那、罗桑坚赞、贡觉仲尼等高僧在此国难当头之际,求大同,存小异,不仅积极参与组织抗日救国会,还与在京藏族僧俗一起发起康藏同胞抗日大游行,宣传誓死抗日救国,以激励民众抗日热情。大会特别发布了《告全国同胞书》,表示:“同仁等籍隶康藏,万里来京,大义所在,不敢后死,爰成立抗日救国会,以与我全国同胞同立一条战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除另电我六百万康藏父老兄弟姐妹,共膺斯义,为政府后盾外,特此电达,尚祈全国同胞以必死之心,救危亡之国,洗五分钟热度之讥,免一盘散沙之诮。”^①大会还作出了关于抗日的6项决议:1. 通电全国各族同胞一致抗日;2. 敦促国民政府早日确定抗日作战方针;3. 电粤息争,共同抗日;4. 发布“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宣言;5. 为国难告康藏同胞书;6. 电十三世达赖喇嘛尽快解决康藏纷争,团结御敌。^②

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的成立对组织和号召藏族同胞进行抗日救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进一步激起他们真挚的爱国热情和誓死抗战的决心。

(二) 救亡运动中的藏传佛教僧人

1932年1月,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

① 《蒙藏旬刊》1931年第1期。

② 《蒙藏旬刊》1934年第5期。

措得知日寇在上海的暴行,愤怒之余,立即令西藏各大寺庙数十万僧人同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祈诵经文,诅咒侵略者,“冀中央政府取得最后胜利”。在这期间,他还多次派僧俗官员到南京,加强与国民政府之间的联系,“发表了坚决支持中央政府,呼吁全国团结共同抗日的主张”。^①事实证明,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面前,他“亲汉之心亦确具真诚”。^②1933 年 12 月 27 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拉萨圆寂。西藏地方摄政热振活佛依照他的遗愿继续带领西藏僧俗群众,举行了 3 次大规模的祈祷法会,“进行唸我军得胜之经,诅寇寇立灭之咒,继续忏诵得最后胜利”。^③热振活佛又于 1939 年 7 月 7 日致电蒋介石,表示支援抗战,电称:“以抗战已进入第二期,日渐胜利,为振奋全藏精神,共同向‘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之目标迈进,以堵击日寇之侵略起见,特于五月十二日在三大寺上下密院及歧古刹诸处,一律设坛,进行祝我军得胜利,并诅日政权立灭之咒。”^④

正在内地的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早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便想到内蒙邻近东北,日寇早已垂涎,必然从中捣鬼,侵我国土,当即从海拉尔赴锡林郭勒盟,揭露日军的暴行,号召内蒙的广大僧俗群众奋起抗战,保卫家园。^⑤

1932 年后,九世班禅巡视上海、北平、察哈尔、绥远、甘肃、青海等地,沿途向僧俗群众宣传抗日救国。在巡视期间,适逢日寇企图染指我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地。他闻讯立即致电国民政府,严

① 牙含章:《达赖喇嘛传》,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15 页。

② 引自《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汉文史料选辑),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③ 《蒙藏旬刊》1934 年第 5 期。

④ 《申报》1939 年 6 月 15 日。

⑤ 陈文鉴:《班禅大师东来十五年大事记》,上海大法轮书局 1948 年版。第 123 页。

正声讨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罪行：“近闻暴日不顾公理，藐视盟约，仗其武力，攻我热榆，视彼用心，无非欲实现其大陆政策之阴谋。现我军民时至忍无可忍，官兵义师前赴后继，为自卫而抵抗，为正义而舍生，救国热忱中外皆钦，班等宣讲国难中应尽之天职，化彼惶恐观望之心理，实行团结，共赴国难。离辕较远者，或派人游说，或分函告诫，令饬各地蒙军加意防范，严守疆地……幸各王公深感大义，先后复函，誓愿执戈报国，共驱倭奴。班禅目击时艰，忧愤无已，虽身属空门，而于救国图存之道，何敢后人，除召集当地藏传佛教僧人千余，自三月一日起，在百灵庙虔诵藏经，广施供养，建立法坛，祈祷和平，并追荐前方阵亡将士，藉佛力之加被，弥战祸于无形。”^① 此电充分表达了九世班禅的抗日救国热忱。

此外，九世班禅还通电全国，呼吁中央安抚蒙民：

沈阳事变，正班禅拟南来之际，乃倭寇猖獗，得寸进尺，甚至多主离间，播散流言，以期逞其野心。班禅蒙政府待遇优容，自愧涓埃之报，当此国难，凡属人民，亦宜奋起，况班禅受国家尊重，岂敢稍存坐视。故绕道西行，由东蒙至西蒙，将及五月，沿途经过，王公百姓，遮道欢迎。班禅即于此时，宣传中央意旨，喻以大义。咸谓东省沦陷，深盼国家决计恢复，誓共图存，以固疆土。等情。足征民心未死。抚绥蒙民，望政府及时注意，速筹良法，免失指臂之效。国防幸焉。至班禅朝夕与蒙古各寺喇嘛诵经祈祷，祝邦家之永奠，弭祸患于无形，区区苦衷，谨电奉闻。^②

九世班禅额尔德尼眼看大好河山惨遭日军蹂躏，要求赴内蒙古各地宣传抗日救国。政府担心此去凶多吉少，劝其勿往。但他恐

① 牙含章：《班禅额尔德尼传》，西藏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04 页。

② 《九世班禅内地活动及返藏受阻档案选编》，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0 年，第 38 页。

改变行期“贻敌人以离间之机，引起蒙地民众之疑惑”。^① 于是不顾自己的安危，毅然前往，长途跋涉两月之久，最后到达热河省的乌盟达罕贝勒等地。他每到一地，便带领当地藏传佛教僧人念经祈祷抗战胜利。同时，召集当地王公贵族，揭露日寇侵略暴行，号召人们拿起枪杆“团结御侮，爱护国家”。九世班禅额尔德尼的爱国行为给予日寇“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的侵略阴谋以有力的打击，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1933年10月18日，国民政府颁布了表彰九世班禅令：

护国宣化广慧大师、西陲宣化使班禅额尔德尼，矢忠党国，愿力恢宏。前膺宣化使命，寒暑央征，勿辞劳瘁。上以阐扬中央之意志，下以激发蒙族之忠忱。德音广被，轸域胥融。顷者国难未已，疆隅多故，该使力镇危疑，维系边局。眷念勋勤，尤深嘉慰。特予崇褒，以彰殊绩。此令。^②

由于九世班禅在内蒙僧俗群众中颇有声望，日本人“屡次前往煽惑，冀其合作，以造成内蒙与中央分离之局面”^③，但是，他深明大义，严辞拒绝了日本侵略者的拉拢，并致电中央政府，斥责日本侵略者的阴谋。据史料记载，当时日本人听说“班禅将前往锡林郭勒盟诵经消息，有拟乘隙挟持班禅，利用宗教手段，使当地脱离中央”。^④ 可见班禅之重，形势之险。有人说：“九·一八国难后，日本用种种方法，勾煽其间，而内蒙古官民，屹然不为所动者，大师宣化之功也。”^⑤ 事实证明，这种评价毫不为过。

抗战前夕与初期，九世班禅还多次在内蒙、青海、四川等地召

① 陈文鉴：《班禅大师东来十五年大事记》，第122页。

② 《九世班禅内地活动及返藏受阻档案选编》，第38页。

③ 《蒙藏旬刊》1932年，第46期。

④ 《申报》1933年6月1日。

⑤ 陈文鉴：《班禅大师东来十五年大事记》，第123页。

集各大寺庙的喇嘛修建坛城,虔诵靖国消灾大经,公祈和平,超荐抗日阵亡将士,自己亦晨夕默诵,未曾稍懈。如1934年5月13日至18日,他在杭州灵隐寺主持了宗旨为祈祷世界和平,超度阵亡抗日将士的“时轮金刚大法会”。^①

九世班禅还慷慨解囊,捐助前线抗日将士。早在抗战前夕,他就曾数次捐赠政府及军委会战马数百匹。^②1937年10月28日,他捐赠医药费3万元,并带头认购救国公债2万元。^③11月8日,他再次为赈济前线伤员及难民,捐款2000元。^④为了祈祷抗战胜利,诅咒日本侵略者,他还曾捐款数千元,修建坛城。

1937年,全面抗战已经开始,九世班禅回藏无端受阻,在青海玉树忿郁成疾。九世班禅在重病中还想到康定召集全康高僧,启建大威德金刚降魔定乱大经,以仁慈之心求全国人民共免劫难。他在圆寂的前几天,得知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忧国忧民,夜不能寐,不顾病重,即命人起草了一份汉藏合璧的《告西陲民众书》,希望广大同胞团结一心,巩固后方,以完成抗日救国之大业。他还下令将所属部分枪支捐出以助抗战。^⑤总之,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始终坚持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立场,并为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三) 其他藏传佛教僧人的抗日义举

1931年9月18日,日寇侵占东北沈阳,时任西藏驻京(南京)总代表兼西藏驻京办事处处长的贡觉仲尼在国难当头之际,积极参与组织“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并利用一切机会支持抗战。

① 《申报》1934年5月15日。

② 陈文鉴:《班禅大师东来十五年大事记》,第124页。

③ 《新华日报》1938年12月9日。

④ 《康导月刊》第5卷第2、3期合刊。

⑤ 《申报》1934年3月4日。

1938 年,日寇大举向我发起进攻,“除了用飞机大炮之外,最毒辣的手段是离间我们的民族”。^① 4 月,蒙、藏、回等族在武汉组织了联合慰劳前线抗战将士代表团。在大敌当前之际,很快就要返回西藏的贡觉仲尼再次站了出来。他在代表团开赴徐州前线的隆重献礼仪式上,用慷慨激昂、形象生动的藏语演讲打动了到场的所有人,充分表达了西藏人民对祖国的赤诚之心。他首先说明自己站在台上是代表西藏地方政府的,不是代表个人的即兴演说。他针对日本人“中国已赤化或耶教化,佛教已被灭,日本为保护佛教及东方文化,向中国作神圣的战争,所以凡信佛的国民都应与本站在一条战线上以对付中国,并且中国是不消三月半年便可被日本征服”的宣传,以藏族高僧的身份向世人说明“日本纯是违反佛教的侵略性,与中国纯为求国家民族自主独立及人类正义和平之抵抗侵略的反侵略性,为国家民族自主独立而抵抗侵略”。他指出:“拉萨是佛教圣地,自从抗战发生以后,有 20 万以上的喇嘛念经,在历史上是最伟大的表现。宗教是本于公理正义的,日本人从前有不少的到拉萨来学密宗,现在他们根本违背了教义。就宗教方面来说也应该制裁。”^② 他的演讲生动活泼,从许多方面说明了汉满蒙回藏本是一体。他特别举出藏族民间两个寓意深刻的比喻,尤其让人感动。一个是说“中国各民族是亲兄弟关系,汉族是大哥,有人打大哥,小弟应该帮助大哥”。一个是说“中国比如一个人,中原是头,其他是手脚,头有了病手足也是不健康的”。^③ 一番发自内心的诚挚话语,表达了他崇高的爱国主义热情,阐述了藏汉各民族的亲密关系。他的演讲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极大地

① 《申报》1938 年 4 月 13 日。

② 《申报》1938 年 4 月 13 日。

③ 《申报》1938 年 4 月 13 日。

鼓舞了在前线浴血奋战的抗日战士。贡觉仲尼卸职回藏后,还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在色拉寺等处举行了为抗日祈祷的大型诵经活动。

又如名扬一时的西藏诺那呼图克图(西藏昌都地区著名活佛,其时正在内地)在抗日救亡中也有突出表现。1931年九一八事变刚发生,诺那呼图克图立即通电全国,表示自己的满腔悲愤,要求政府出兵抗日。他说:“警耗传来,我等痛愤之亟,发指血腾。悲愤之余,唯一希望政府者,即请立下全国总动员令,驱彼倭奴,还我故土,窃日本帝国主义之敢于悍然不顾,迹其居心,缘已垂涎甚久,宿望至殷,事前筹划已详,进攻步骤如此严整,此非抗议交涉,即能璧还失地,处此千钧一发之际,国人无不愿以灼热赤血,洗此奇耻,刷此大辱。以我等老耄之力,亦愿与之一击,宁作战死鬼,不为亡国奴。”“尚望全国同胞一致主张,共赴国难,不胜迫切待命之至。”^①此后,他还多次在上海、南京等地主持“大白伞护国法会”上传授旨在镇护国家,退却强敌,息灾解难的大白伞盖坚甲咒等经咒、仪轨,这在当时对民众颇有影响。

再如参加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国难会议”的藏族代表贡觉仲尼、罗桑坚赞等,不仅强烈要求国民政府出兵抗日,表示将身体力行,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斗争中去,还就藏事提出了“改善蒙藏军事政务、宗教、教育以御外侮案”,即“为消弭蒙藏危机,巩固边圉方法四项”,表示要在紧要关头,“使边疆人民心理上有所皈依,亦即巩固蒙藏地方,维护中央抵御外侮”。^②

与此同时,四川、青海、甘肃等地区的藏传佛教高僧也带领本地藏族僧俗群众在日寇侵入,国难方殷之际,戮力同心,投身于救

① 《蒙藏月报》1931年,第9卷第1期。

② 刘曼卿:《国民政府女密使赴藏纪实》,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页。

亡图存之中。

四川甘孜白利寺格达活佛在红军长征到达甘孜时,任博巴(藏人)政府主席,积极支援红军北上抗日,与朱德总司令结下深厚友谊。红军北上后,他仍时常牵挂红军和前线战情,四处打听红军的消息。当得知朱总司令率领的红军胜利抵达陕北后,立即设法买了一本有朱德照片的书供在家里,后又从青海买回“八路军陕西奋战图”,挂在墙上,每日为抗日的八路军将士祈祷。^①其间,炉霍、道孚、甘孜等藏区 57 寺僧人还联合致电国民政府,表示:“暴日入寇,五族同仇……僧伽等分属国民,爱护国家,利乐有情,未敢后人。谨于每月东日举行月会时,虔诚挚心,增诵经课,面向三宝,为国家民众祈求胜利。”^②1940 年,四川金川广法寺代理堪布嘉绒格西率十八土司寺庙代表向国民政府献旗,以表决心。^③十一世司徒活佛白马翁须亲赴重庆,主持祈祷抗战胜利大法会,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八邦寺现存的瓷济公、伏虎罗汉像等均为当时国民政府所赠。^④

1939 年 5 月,青海著名的藏传佛教高僧喜饶嘉措大师赴各大寺庙视察,号召僧俗民众团结起来,共赴国难,并撰写了《白法螺的声音》等宣传抗日的文章。甘肃祁连山三十三族藏族群众坚决支持抗日战争,在该地区政教领袖顾嘉堪布的领导下,召开了“追荐抗日阵亡将士暨殉难同胞大会”、“抗日宣传大会”。到会群众达 4

① 周锡银:《为西藏和平解放而献身的格达活佛》,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 42 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② 转引自《康导月刊》,1939 年第 11 期。

③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方志编委编:《阿坝州志》“大事记述”,民族出版社 1994 年版。

④ 袁晓文、陶利辉:《四川藏族对抗战的贡献》(四),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38—139 页。

万余人。1937年,嘉木样五世还不顾辛劳,从甘肃翻山越岭至西藏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前后藏僧民,经此宣传,莫不切齿痛恨暴日凌我之奇耻大辱”。^①

这期间在内地的藏传佛教僧人也举行了不同形式的抗日活动。如1937年9月17日,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等到五台山地区勘察地形、了解僧侣和群众的生活和思想情况时,专门走访了当地藏传佛教高僧罗桑巴桑、依什捧磋、章嘉活佛等。这几位藏传佛教高僧对抗日将领的到来深表欢迎,热情接待,并组织听取抗日救国双十纲领的演讲,表示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的方针政策。1937年10月,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等为团结各族僧侣,专程到善财洞(寺)拜见主持五台山藏传佛教事务的扎萨克大喇嘛罗桑巴桑,商谈救国大计。自此,罗桑巴桑与中共经常保持秘密联系,主动接近抗日干部,积极发动藏传佛教同乡进行抗日斗争,团结藏传佛教僧人抗日,受到抗日政府的表彰。^②

1938年4月13日至4月17日,五台山分别举行“抗日阵亡将士追悼会”、“庆贺平型关、忻口战役胜利大会”,藏传佛教僧人和同胞近千人参加。到会的藏传佛教僧人和同胞向烈士表示哀悼,诵经祈祷。在参加庆贺“两大战役”胜利的大会上,藏传佛教僧侣及群众欢呼口号进入会场。会后又参加了大规模的抗日游行活动。许多藏传佛教僧人还参加了抗日宣传和自卫队军训等。尤为值得一提的是,1938年秋至1939年春,有百余名五台山僧人参加了八路军,其中包括菩萨顶等10处藏传佛教寺庙僧人30余人。他们被编入晋察冀二分区四团,人称“僧人连”,充分显示了藏传佛

① 见《康导月刊》,1939年第10期。

② 辛补堂:《抗日救国匹夫有责》,《西藏民族宗教》1995年第2期。

教同胞抗日爱国的饱满情绪。^①

这些藏传佛教上层人士,虽身属空门,但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为了维护国家统一,为抗日战争的早日胜利,尽己所能,充分表现了高涨的抗日救国热情。同时,也带动了广大藏族民众踊跃投入抗日救亡行列。他们强烈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华民族,坚决反对投降的行为,是长期以来,蕴藏在心中那炽热的爱国精神的迸发,是他们强烈希望建立一个强盛国家愿望的集中体现,对于鼓舞藏族人民乃至全国人民的斗志,推动抗日高潮进一步向前发展,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

1931年抗战尚未全面爆发之时,在南京、北平的西藏僧俗人士便组织了抗日义勇队,进行军事训练,时刻准备上战场。^②班禅堪布会议厅致电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称:“暴日侵袭,举国同仇,正义感召,胜利必操……唯遵先大师遗志,拥护中央,团结边民,奠安后方,以抒西顾,誓竭所能,以利抗战。”

1938年12月,西藏哲蚌寺僧众顾及“国家军事,急需要兵力甚殷”,提出应于康藏各地早实行政令,征集兵员,在国家民族需要寺僧之时,亦愿拿起枪杆。^③那些不能亲自上战场杀敌的民众也积极以财力、物力支援抗战,其中不乏藏传佛教僧人。别蚌寺大会致国民政府公呈表示:“现在需将敌人驱出境外,必须五族同心,

① 辛补堂:《抗日救国匹夫有责》,《西藏民族宗教》1995年第2期。

② 《蒙藏旬刊》第41期。

③ 转引自《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94页。

为国事有钱者出钱,无钱者以血肉之躯来捍卫土地。是为迫切者……各级一心对付暴日,希望能将日本根本剿除……我等三寺自前年卢沟桥事变起后,一年有余,为国家胜利而祈祷,昼夜恒未间断。”^①这些藏族的普通僧人由于与内地遥隔千山万水,“不能有所效力”,但仍时刻关心着祖国的安危,密切地注视着抗日战争的进展。当时,西藏拉萨等地的僧俗民众常成群结队前往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了解战况,并托办事处向中央政府转达西藏僧俗民众坚决支持抗战的决心。西藏僧俗各阶层人士莫不祈求中国胜利,各寺曾自动诵经祈祷。九世班禅去世后,扎什伦布等寺庙的僧人仍“惟日以诵经礼佛,祈祷我国抗战胜利”。^②

西藏僧俗人士为抗战取得的胜利而喜,为暂时的失利而悲。这一点我们从“康藏民众抗战赴难宣传团”1939年在藏的活动可知一斑。^③当时,宣传团利用正月十五日的拉萨传召大法会的机会,深入到各大寺庙拜访高僧,介绍抗战情况,并着重宣讲两个问题。首先,针对日本所散布的中国为反佛教国家的谎言,说明中国宗教信仰自由,中央历来尊崇佛教,内地各省佛教素来兴盛。其次,说明日本与清逊帝的关系,阐述清末国事衰乱,朝廷不能维持,故而取消帝制,建立民国;日本近年利用溥仪为傀儡之用意,无非是便于侵略中国。这两个问题的解释说明非常及时,极具针对性。同时,宣传团援例敬各寺清茶、灯油之资,以作抗战胜利的祈祷,“所有接触之喇嘛莫不关切同情”。

再如1938年12月,汪精卫等人公开叛国投敌。西藏僧俗民众闻讯反响强烈,翌年3月,拉萨僧俗民众急电国民政府,严正指

① 转引自《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494页。

② 《申报》1940年4月5日。

③ 刘曼卿:《国民政府女密使赴藏纪实》,民族出版社1998版,第16页。

出：“汪逆兆铭，叛党辱先，迭签丧权之密约，妄组降敌之伪府，阴谋所布，举国痛愤，我拉萨市民众，久坚抗战到底之决心，誓不与国贼共立，特电声讨。”^①这篇声讨卖国者的檄文，揭露了投降派可耻的嘴脸，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充分表现了广大藏族人民嫉恶如仇，泾渭分明的爱国主义精神。

位卑未敢忘忧国，正是这些西藏僧众的心理写照。他们关心着抗日前线的将士，惦念着铁蹄下的苦难同胞，决心“把人力物力集中，贡献于抗战”。^②正如一位佛教大师所说：“我后方的群众，尤应以外财施及法施慰劳之……慰劳抗战军人及家属，确为全国任何一界，任何个人所无不热心。凡我贫苦的寺庵僧尼，亦应各人从少吃一碗饭，少嚼一茎菜之节储，不论两角三角、一元二元的，每个人多少要有些供献，勿失却中国佛教徒竞修布施功德的最良机会，并表示我们僧徒较一般人加倍的爱国热诚！”^③

1939 年 5 月，班禅大师行辕暨西藏僧俗民众又组织了以丁杰佛为团长、拉敏益西楚臣为副团长的 14 人代表团风餐露宿，赶赴前线，慰劳抗日将士。他们通电全国，表示：“日军侵华，行将两载，赖我将士浴血抗战，扬国威于世界，最后胜利如在掌握，行见五千年文化之邦，重开自由独立之花……本代表团谨代表班禅大师行辕全体人员暨西藏僧俗民众，星夜东来，谨向最高领袖及公等并全体将士献旗，面致慰劳，并献呈医药慰劳费九千元，聊表藏胞关念微忱，兹由本团全体同仁合摄献旗影片，连同锦旗暨医药慰劳费呈则由军事委员会分别转送，聊当本团同仁躬亲呈献，敬乞查纳。”^④

① 《蒙藏月报》第 11 卷第 2、3 期。

② 《申报》1938 年 4 月 13 日。

③ 《海潮音》1941 年，第 22 卷第 5 期。

④ 《申报》1939 年 5 月 30 日。

1939年入藏的“康藏民众抗敌赴难宣传团”离开拉萨前，一些僧俗民众捐献了自织的110多匹氍毹，委托他们制成军用背心，带到前方，分送抗日将士。这些氍毹质料、花纹极其特殊，可制成背心400多件。虽然为数不多，但可“表示遥远后方之西藏民众自动敬慕抗战将士热忱”。^①

1944年10月，西藏僧俗群众省吃俭用，捐赠国币500万元。用这笔钱可购飞机25架，组成近3个空军大队。^②

还应指出的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中国失去获取外援的重要国际通道时，古老的康藏印驿运线又发挥了它特殊的作用。“山间铃响马帮来”，藏族僧俗民众赶着满载物资的驮马，络绎不绝地跋涉在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高山峻岭之间。有资料表明，这条驿运线上经常有驮马3万多头往返，每月由印度运出物资约4000驮，合240吨。照此计算，每年可运物资3000吨（单程）。可以想象这对前线将士会有多大的帮助。而在这些马帮中，有许多人是西藏寺庙派出的僧侣。他们用自己的汗水和鲜血支援了抗日战争。^③

四川地区的藏传佛教高僧在这场战争中表现尤为突出，他们四处奔走，以自己的微薄之力表达他们的抗日救国热忱。1938年夏天，在本地区颇有威望的青襁呼图克图、贡嘎呼图克图以及藏传佛教委员会委员、参谋本部专门委员格桑泽仁等人在西康发起募捐，用于购置慰劳品和锦旗，并组织了“西康民众慰劳前线抗日将士代表团”。他们到重庆后，立即将在藏区募捐的金银首饰（银质饰物40斤零10两5钱，金质饰物6件，纱洋85元4角，大洋19

① 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档案卷号：（一四一）2387，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

② 《蒙藏月报》第16卷第9、10期合刊。

③ 《边疆通讯》第3卷第8期，第17页。

元,小洋 11 元)一并献给国家,以应抗战之需。同时,他们还代表四川藏区的藏族民众表示要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齐心协力,誓做抗战前线将士的坚强后盾,并继续“倾康藏人力、物力,分期分批贡献给国家”。^①他们从前线回到四川藏区后,仍积极地活动,四处奔走,为抗战募捐。后来,格桑泽仁还到重庆红岩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向周恩来敬献锦旗和哈达,表达四川藏族对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坚持抗日斗争的由衷敬意。^②

1939 年 1 月,时值冬令,凛冽的寒风中,康藏民众首先想到了正在与日寇顽强奋战的前线军民。于是,人们在贡嘎活佛等人的带领下,再次捐赠前方将士有良好御寒作用的卫藏氍毹 120 匹。^③后来又将各种土特产品、皮毛、珍贵药材等送到征聘寒衣分会。时间不久,分会为了汇兑方便,将征得的各种物品折合成款,竟已达 2 万元。^④

另外,青海省的藏族在其政教领袖的号召下,与其他兄弟民族一道为抗战将士征募寒衣更为踊跃。他们一次就捐献羊皮袄 10 万件之多,有利地支援了前线军民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⑤

甘肃藏族僧俗百姓,对前方将士的英勇行为也十分敬佩,专门召开了各寺僧官和各部落头人大会,以唤起藏区民众必胜的信心。到会人员一致决定组织赴前线慰问团,代表拉卜楞藏族同胞亲自赶赴战区,慰问坚持抗战的前线将士,表达自己的爱国热忱。1937 年初,甘肃祁连山三十三族地区藏族僧俗群众在该地区政教领袖顾嘉堪布、贡布什加等带领下,组织了“甘肃祁连山藏民慰劳抗战

① 《新华日报》1938 年 7 月 12 日。

② 江安西:《格桑泽仁小传》,四川巴塘县志办 1985 年编印。

③ 《蒙藏月报》1939 年,第 11 卷第 2、3 期。

④ 《新华月报》1939 年 11 月 28 日,1938 年 7 月 12 日。

⑤ 《新华月报》1939 年 1 月 10 日。

将士代表团”，并捐赠了各种慰问品。^① 1938年，远在拉萨的五世嘉木样呼图克图电令其兄阿旺嘉措组成“拉卜楞寺一百零八寺僧民慰劳前方将士代表团”，携带羊皮1万余张和其他慰问品，奔赴重庆和各战区。1943年8月，五世嘉木样呼图克图等发动所属各寺院、各部落，筹集了可购30架飞机的巨款（每架银币3万元，合计银币90万元），由嘉木样呼图克图之兄洛桑泽旺亲自担任团长，带领其弟拉卜楞寺阿莽仓活佛等数十人，到重庆捐助。他们的义举“打破了边民向国家献机的纪录”，受到政府首脑的接见和民众的热烈欢迎。各大学纷纷邀请洛桑泽旺前往演讲。当时，多家报纸都作了报道，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由于拉卜楞寺支援抗战事迹突出，国民政府特明令嘉奖，颁给“输财为国”匾额一方。^②

五台山藏传佛教僧人也不甘后人。1938年2月19日，藏传佛教寺庙派二喇嘛依什捧磋参加了晋察冀边区抗敌后援会。会上依什捧磋介绍了五台山各族僧侣热爱和支援八路军皮衣物防寒取暖等事迹。1938年6月17日，藏传佛教同乡会再次发动藏传佛教同胞为驻扎在五台山地区的抗日军队募捐防寒的各种衣服、鞋袜等300余件；并给驻军腾出暖房，供给柴火，赠送粮食，募捐钱物，为开辟五台山根据地做出了自己的贡献。1938年7月30日和10月1日，五台山蒙藏同乡会发起与组织了慰劳抗日前线将士的活动。第一次黄庙僧人捐出了白洋150元，蒙藏同胞募捐白洋49元；第二次捐募干粉106斤、红糖20斤、茶叶5斤、大米200斤、省票30元。蒙藏同乡会的这一行动，带动起五台山其他寺庙的和尚和当地农民群众，掀起募捐慰劳抗日将士的热潮。^③

① 黄正清：《辅国阐化正觉禅师嘉木样呼图克图纪念册》，1940年铅印版。

② 王劲：《甘宁青民国人物》，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9页。

③ 辛补堂：《抗日救国匹夫有责》，《西藏民族宗教》1995年第2期。

1937年8月至1938年9月,五台山藏传佛教寺庙积极贯彻执行边区政府推行的减租减息政策,减轻了当地人民的负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台麓寺二喇嘛依什捧磋,响应边区政府号召,拥护“二五”减租政策,带头执行合理负担,从该寺所属的佃户中,每年减少租粮15万斤,占年收租粮的20.6%;1938年3月20日,晋察冀边区政府从埠平县移驻在台麓寺,依什捧磋发动僧众从多方面提供方便,主动完成抗日爱国公粮20石。依什捧磋由于积极支持边区政府地抗日救国工作,被选举为晋察冀边区的参议员。从此,他便为抗日救国做出更多奉献,在五台山各寺庙起到带头的作用。另外,在1938年4月和1943年2月,五台山23名藏传佛教僧人和20余名章嘉活佛的卫队,经过动员,认识到“出家没出国理当应爱国”,先后两次将埋藏于山洞和地下密窟中的各种枪支438件,子弹30余箱(包括零散弹药),取出来武装了晋东北抗日军队。藏传佛教僧人这一举动受到抗日政府和人民的赞扬。^①

藏族人民的捐款和礼物,是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用辛勤的劳动和血汗换来的,是很不容易的。在此我们仅举一例,五世嘉木样呼图克图等发动拉布楞寺所属各寺院、各部落,筹集了可购30架飞机的巨款(每架银币3万元,合计银币90万元)。当时,甘肃夏河全县仅56788人,拉卜楞所属教区为50万人。以全县人口计,平均每人仅为国家献机一事就要付出15.85元;以全教区人口计,平均每人也要捐出一元以上。许多百姓是卖牛卖羊才筹足应出的份额。但是,为了抗战的胜利,他们无私地奉献,为前线军民坚持长期抗战提供了一定经济基础。总之,无论是在西藏地区的还是川、青、甘地区的藏传佛教僧人,在抗战的艰苦岁月中,积极地动员和号召群众以财力、物力支援抗战。他们积极为国家民族奉献,成

① 辛补堂:《抗日救国匹夫有责》,《西藏民族宗教》1995年第2期。

为藏族人民抗日救国的带头人。钱财物资对抗战是急需的,但重要的是体现了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这对于推动和促进前线军民团结抗战起到的作用不可低估。这一切又与当时藏传佛教中的有识之士率先垂范、奔走呼吁是分不开的。

三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藏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① 在抗日战争中,藏族僧人积极投身抗日救亡的事迹,更是在藏族人民反帝爱国的斗争史上,谱写了新的篇章,在中国现代史上也留下了光辉的一页。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还不能将抗日战争中藏族僧人的活动全面、系统地加以评述和总结,但仍然可以看出这些活动的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藏传佛教高僧的参与,带动和影响了广大民众。

民国时期,西藏社会的性质仍为政教合一,藏传佛教在政治上、思想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众所周知,在当时,藏族绝大多数世俗民众是虔信藏传佛教的,藏传佛教高僧既是他们的政治首领,又是精神领袖。在这种情形下“宗教对家庭关系、社会影响就更大些”。^② 战前,西藏“一般民众对于国事或少注意”,但自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残酷的现实使不少藏传佛教高僧明白了“倘若隐忍,国亡立至”,从而认识到“欲哭无泪,哭亦非计,此时不战,又将何待”。^③ 而藏传佛教高僧参与到反侵略斗争中,对广大的藏族僧俗群众便具有很大的鼓舞作用,带动他们也成为抗日救国阵线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6页。

②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9页。

③ 《蒙藏旬刊》1934年第4期。

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诚然,反侵略的道理不一定人人都清楚,不少藏族僧人就简单地认为外国人会消灭佛教,这种从宗教教义出发排外的特性,在当时,也成为反侵略战争的积极因素。因为,藏传佛教信徒坚信藏传佛教高僧投入抗日战争,斗争的正义性、必胜性就毫无疑问。他们对日本侵略者践踏我大好河山,屠杀中华民族同胞的罪行无不愤慨;为自己不能亲赴前线深感遗憾。他们时刻惦记着抗日前线的战士,尽自己的全力捐献款物,积极投身于反侵略战争中。而远在西陲的藏族人民积极行动起来,给了前线军民以极大信心,使他们更加真切地感受到祖国各族人民团结的坚强力量。这对于推动全国抗日高潮进一步向前发展,促进中华各民族团结抗击日本侵略,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

其次,藏传佛教高僧的抗日活动,增进了各民族间的团结。

在中华民族反帝爱国的斗争中,更多的藏族僧人认识到“中国的抗战,不蒂为各佛教民族的共同要求而抗战,设非中国抗战胜利,则各佛教民族皆将受日本侵略而无独立自主之日!”^①他们进一步清醒地看到祖国的前途与自己的命运息息相关,唇亡则齿寒。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时刻,只有与各兄弟民族人民紧紧的维系在一起,才能拯救祖国,从而拯救自己。正如“康藏民众代表慰问前线将士书”中所说:“中国是包括固有之二十八省,蒙古、西藏而成之整个国土,中华民族是由我汉、满、蒙、回、藏及其他各民族而成的整个大国族。日本帝国主义肆意武力侵略,其目的实欲亡我整个国家,奴我整个民族,凡我任何一部分土地,任何一部分人民,均无苟全幸存之理。”^②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利用这场战争挑拨中国各民族的关系,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但是,“哪里知道卢沟桥

① 《反侵略》1937 年第 34 期。

② 《新华日报》1938 年 7 月 12 日。

的炮声反而促成了中华民族的精诚团结——“汉满蒙回藏的联合”。这场斗争加深了各民族间的互相了解,促进了民族大团结与协作。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所表现出的高度凝聚力和强大生命力,成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先决条件和决定因素。藏族僧人的抗日救亡运动,对于鼓舞抗日斗志,推动抗战高潮进一步发展,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增强民族凝聚力,无疑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难怪有媒体认为,“于此可见中华民族之真正团结已有坚实基础”。^①

这里,我们还要提到,藏族僧人的抗日活动还促进了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当时,不少高僧如九世班禅额尔德尼、诺那呼图克图、贡嘎呼图克图、贡觉仲尼、罗桑坚赞等因为种种原因来到内地。他们值此特殊形势下,本着普渡众生,爱国爱教之旨,身处佛门,心系民族存亡,以国家为重,矢志不渝投身抗日救国,举行了各种法会,祈祷胜利,诅咒敌人,唤醒民众必胜之信念,并身体力行,捐款捐物,在内地民众中留下了较好的印象,为时人所传诵。于是,在抗日救国的浪潮中,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也大大推进了一步,更加密切了与兄弟民族文化的交往。

再次,藏传佛教界在抗日救亡中加强了内部团结。

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出奔内地后,藏传佛教格鲁派两大领袖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虽经国民政府调解,仍难重归于好。双方代表势不两立,在南京多次进行唇枪舌战。但在大敌当前,民族危亡之际,他们求同存异,接触增多,把斗争矛头一致指向日本帝国主义。双方积极配合组织了“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发表“告全国同胞书”,而且肩并肩,手挽手走向街头,参加抗日大游行。双方驻京代表还一起参加了“蒙回藏同胞联合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

^① 《新华日报》1938年10月9日。

分赴前线,慰劳将士。正是在外敌入侵的形势下,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与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尼玛之间的矛盾开始趋于缓和。当然,这其中原因很多,但“兄弟阋墙,外御其侮”无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这期间,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尼玛多次派安钦活佛、王乐阶等人前往西藏,商谈回藏之事,都受到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优礼延见,大悟过去全系两方属僚猜忌而起,切望早日回藏,共谋众生安宁,班禅得报,欣慰不已”。^①这段记载充分表明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不念旧嫌,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的爱国主义情怀。

近百年来,在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中,抗日战争第一次以取得完全胜利而载入史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战争的胜利到现在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但我们不能忘记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为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所做出的贡献。尤其是今天复杂的国际环境决定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并非坦途,只有在民族成员空前凝聚的前提下,我们的国家才能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作者喜饶尼玛,1955年生,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李仲明)

① 《申报》1940年2月25日。